

一分钱中恤民生

张达明

开国总理周恩来的工资在去世前一直保持在每月404.80元的水平上,加上邓颖超的342.70元,夫妇俩共是747.50元。但他们两人从未管理过家里的财务,一切收支都是由周恩来的司机杨金铭掌握。家里不管谁买什么东西,大到沙发暖蛋,小至油盐酱醋米,经手人都必须开好发票,然后至少有两人以上签名,才能去杨金铭那里报账,然后每个月月底,再由杨金铭向邓颖超报一次账,而周恩来一般很少过问收支情况。

但在上世纪60年代中期的某一天中午,周恩来突然对杨金铭提出,他要听听家里近两个月详细的收支情况。杨金铭顿时很紧张,暗想:难道自己什么地方做错了,违反了开支规定?他边想边拿来了平时的记账本,忐忑不安地去了周恩来办公室。

周恩来请杨金铭坐下,然后让他仔细报一下家庭开支账。

杨金铭翻开账本,紧张地对周恩来一笔一笔念起来:

3月1日买大葱5分钱,厨房用;

3月2日买毛巾一条3毛2分,客厅用;

3月2日买干面5斤,7毛钱,交厨房;

3月2日买盐一斤,1毛5分,厨房用。

杨金铭还要继续接着念下去,这时突然听到周恩来喊了一句:“停。”疑惑的目光看着杨金铭,问道:“食盐应该是每斤1毛4分钱,你们怎么多花了我一分钱?”

杨金铭听周恩来这样说,更加紧张了,额头上也渗出了细密密的汗珠,他顾不得擦掉,赶忙放下手中的

账本,跑去找来了当初买盐时的那张原始发票,只见上面清晰地写着:“咸盐一斤,壹角伍分。”便把发票递给周恩来看。

周恩来接过发票仔细查看后,眉头不经意皱了一下,又沉思了一会,然后示意杨金铭退出办公室,接着便拿起电话打给北京市有关部门,询问民用食盐每斤为什么比原来多了一分钱,当他得知是因北京卫生局为预防市民患肿脖子病而对食盐普遍加了碘,根据成本对食用盐价格每斤提高了一分钱后,周恩来这才放心来。

下午周恩来外出开会时,对开车的杨金铭说:“你莫要怪我哟,我并不是在有意多开支了那一分钱,也不是说你账管理得不好,主要是因为食盐是千家万户都离不开的日常用品,没有正当理由是绝对不能随意涨价的。”

此时,杨金铭悬着的那颗心才放了下来,更为周恩来能从细微的一分钱盐价中体恤民生的高贵品质感动万分,他的眼睛不禁湿润了。

摘自《文汇报》

1975年11月26日上午,“长征2号”火箭携带“尖兵”返回式卫星顺利升空。张爱萍将军电话询问现场指挥马捷能否顺利回收,马捷答:“胜利在望。”张爱萍将军一字一顿曰:“胜利在望不行,一定要胜利在握。”

1976年1月18日,北京先农坛体育场。造反派召集万人批斗张爱萍将军。大会决定:张爱萍要有个检讨。是日,张爱萍将军带病泰然赴会,登台检讨曰:“去年3月我重新工作以来,接触了一些单位,接触了一部分干部群众,讲了一些话,也做了一些决定。假如我犯了路线错误,将由我个人承担全部责任。与其他同志没有任何关系。”检讨仅寥寥数语,心平气和,不卑不亢。言毕即拄杖离席,若无其事。

当事人后来言:“张爱萍将军讲错误为假如,责任是个人,作检讨仍不失大将风度,名士品格!”

粉碎“四人帮”后,张爱萍将军第三度出山。将军意气风发,以横扫千军之势,率领国防科研大军出色完成三项国防科研任务,将军谓之“三抓”。1980年3月,成功地向太平洋海域发射了远程运载火箭——洲际导弹;1982年10月,成功地向太平洋海域发射了潜艇水下发射的潜地火箭;1984年4月,成功发射了地球同步轨道静止通信卫星。

摘自《北京日报》

李莲英戏弄李鸿章

吕 斐

清朝时,内官太监李莲英仗着主子慈禧的宠爱,倾倾朝野,飞扬跋扈。人人都敬他如神似的,对他又敬又畏。而身居高位的李鸿章,却对这个阉人不感冒,时不时地还对李大总管冷嘲热讽一番。因此,虽然李总管和李中堂300年前是一家,但两人总是冷脸相向,各自为政。

李莲英是个心胸狭窄,睚眦必报的人。他想:李鸿章这老小子,居然敢轻视我,真不知天高地厚,得给他点颜色瞧瞧。

那天,李莲英突然一改常态,笑嘻嘻地凑近李鸿章耳边低语,说老佛爷近年有意静居,想把清漪园修缮一下,颐养天年。只是银根紧缺,无以为计。李大人是朝廷重臣,若能体仰上意,玉成此事,以宽太后圣心,当立下不世之功。

李鸿章一听有巴结太后的机会,一时激动,遂不计前嫌,当即献计献策,同李公公商量,自己可以借办新式海军,责成各地县府筹款资助,然后从中提取七成作为太后装修清漪园的费用。

李莲英笑容可掬,当即竖起大拇指谄媚地说:“李大人高明!不愧是读书人,见多识广,再难的事,在你这儿也能迎刃而解。佩服,佩服。”

雍正帝力推“普通话”

陈令申

1728年,清世宗雍正设立“正音书馆”,在全国推行北京官话。他谕令福建、广东两省推行汉族共同语(旧称“官话”)。并规定“举人永员巩固童生不谙官话者不准送试。”意思是,读书人若听不懂官话,不会说官话,就不能参加科举考试。

一个把满语视为国语和民族标志的满族皇帝,此时却破天荒地地下了一道推行汉语普通话的谕令,在当时引起了极大的反响。

上谕颁布后,闽粤二省的各个郡县普遍建立了正音书院,教授官

话,凡是走读书、考试、当官之路的读书人都要懂得官话。甚至一度规定,不会讲说官话的童生,不得考取秀才。

雍正帝的“推普”上谕不可谓没有远见,“推普”措施似乎不可谓不力,然而收效甚微。据记载:“初时甚为认真,无如地方官悉视为不急之务,日久皆就颓废,至嘉庆、道光时,福建仅存邵武郡城一所,然亦改科制,广东则更无闻矣。”

“推普”上谕尽管没有达到理想的效果,但还是有一些积极作用和影响。作为“推普”的首倡者,雍正

派一名亲信太监,捧着圣旨,指着“罪臣”的鼻子,当众辱骂。被骂的人既不能申辩更不能回骂,必须伏在地上谢恩。因为这骂骂的太监,代表的是最高权力呀!若是骂人的执行者用文臣的骂法,尚可忍受。可多数太监倚仗权势,常常把全天下最不堪入耳、最恶毒下流的话,像泼水一样,劈头盖脸地朝你泼来。泼到最后还要踩着脚喝令“混账王八蛋滚下去”。这样的惩罚虽不伤皮肉,可对饱读诗书、深谙廉耻的官员来说,简直是奇耻大辱。其时,因受骂不过,一气成病,嗚呼哀哉的官员大有人在。比如御史张百熙,就因无钱贿赂“执法者”,遭受申伤而抑郁死去。

俗话说“破财免灾”。李鸿章是何等精明之人,什么样的大风大浪没见过?什么样的官场潜规则、潜交易不知道?他立刻着人送给李莲英5000两银票,并给两位执法太监各送400两雪花银。于是,太监在责骂时,嘴巴就短了一截,喷出来的骂词自然就“文雅”了许多。最后说了句“下去吧”,敷衍了事。而李莲英看到李鸿章俯首告饶,自己也出了心中那口恶气,既挣了面子又捞了银子,乐得“和气生财”,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冷静下来的李鸿章,知道自己吃了李莲英的哑巴亏,尽管心里恨不能饮其血,啖其肉,但表面上,却对这位“九千岁”刮目相看,如同对慈禧一般恭敬,不敢轻慢。

摘自《报刊精英》

帝为后来的张之洞等提出“官音统一天下语言”的思想和举措奠定了基础。

1902年,张之洞、张百熙等为清廷制定《学务纲要》指出:“中国民间各操土音,致一省之人彼此不能通语,办事动多扞格,兹拟官音统一天下语言,故自师范以及高等小学堂,均于中国文一科内附于官话一门。其练习官话,各学堂皆以用《圣谕广训直解》一书为准。”

显然,张之洞等人的“推普”思想继承和发展了雍正帝“推普”上谕的精髓,并加以发展。1909年,清政府资政院开会,议员江谦正式提出把“官话”正名为“国语”。

其中,雍正的筌路蓝缕之功是必须得到肯定的。

摘自《山东商报》

ZHENGZHOU DAILY

编辑 李昆霞 电话 67655539 E-mail:zwbwb1616@sina.com

玫瑰的底蕴

刘元举

据说,当年海菲茨演奏布鲁赫的《苏格兰幻想曲》时,令伴奏的乐团成员说再也不想拉小提琴了;据说,加里米安斯言郑京和演奏不好布鲁赫的《苏格兰幻想曲》,这位倔强的女小提琴家不服气,发奋苦练,结果获得了成功。

我不知道深圳交响乐团的提琴演奏员们在与陈曦同台拉这首曲子后,有什么感受与说道。倒是来自耶鲁大学的韩国指挥家威信益无法掩饰内心的激动,他与陈曦拥抱时亲吻了陈曦的额头。这位一向激情并不外露的韩国指挥家,仿佛与深圳交响乐团这支年轻的乐队有着先天的默契,下半场的《图画展览会》也大受欢迎,他让深圳交响乐团的这场演出走向经典。

两年前也是在深圳,听了陈曦的小提琴独奏音乐会。那一次,他使用史特拉底瓦里演奏《夏日里最后一朵玫瑰》。他说,小时候父亲告诉他,如果能拉这首“玫瑰”,小提琴就算学会了!

那一次,他演奏的“玫瑰”在深圳的夏日里芬芳弥漫。这一次,他换了一把瓜涅里小提琴,与深圳交响乐团联袂演奏《苏格兰幻想曲》,还有两首安可,让我们看到了“玫瑰”的底蕴。

布鲁赫的这首幻想曲,采用了苏格兰民歌主题。格里格、德沃夏克等音乐大师,也都喜欢这样采用民谣、民间舞曲去创作,这样一来,他们的音乐风格就在很大程度上会受到民歌式的影响。在抒情方面,布鲁赫既不像格里格,有着民歌式的朴素与健康;也不似拉赫玛尼诺夫的那种浓烈或柴可夫斯基式的感伤。他有更加丰富的味道。在陈曦演奏之前,我还曾想过,这位一举夺得过柴可夫斯基音乐大奖的骄子,会如何处理这种民歌式的抒情呢?会不会受到以往老柴那种感伤式的影响?

陈曦和深圳交响乐团的合作堪称是鱼水交融,舞台气氛显得非常融洽。引子部分沉郁哀婉,小提琴恰恰到好处地插入,清亮迷人。陈曦在沉稳中以忧伤的口气,给我们讲述着布鲁赫的苏格兰,就像讲述他自己的故乡。那么近的距离。每一根弦颤,揪着你的心。凄美的诉说,在灵魂中穿越。从苏格兰民谣演变过来的旋律,十分动人。装上了弱音器的伴奏弦乐,音色缥缈,迷离如幻。

体现乐队的豪迈高蹈,在于第四乐章。而高潮也在这个乐章。小提琴令人肝肠寸断,深圳交响乐团的协奏,达到了辉煌的地步。

观众的热烈的场面是不多见的。

品味独处

叔本华

能够自得其乐,感觉到万物皆备于我,并可以说出这样的话:我的拥有就在我身——这是构成幸福的最重要的内容。因此,亚里士多德说过的一句话值得反复回味:幸福属于那些容易感到满足的人。

生活在社交人群当中必然要求人们相互迁就和忍让;因此,人们聚会的场面越大,就越容易变得枯燥乏味。只有当一个人独处的时候,他才可以完全成为自己。谁要是不热爱独处,那他也就是不热爱自由,因为只有当一个人独处的时候,他才是自由的。拘谨、掣肘不可避免地伴随着社交聚会。

在独处的时候,一个可怜虫就会

感到自己的全部可怜之处,而一个具有丰富思想的人只会感到自己丰富的思想。一言以蔽之:一个人只会感到自己的自身。进一步而言,一个人在大自然的级别中所处的位置越高,那他就越孤独,这是根本的,同时也是必然的。如果一个人身体的孤独和精神的孤独互相对应,那反倒对他大有好处。

从这种意义上说,我们可以把社会人群比喻为一堆火,明智的人在取暖的时候懂得与火保持一段距离,不会像傻瓜那样太过靠近火堆;后者在灼伤自己以后,就一头扎进寒冷的孤独之中,大声地抱怨那灼人的火苗。

《爱之忧伤》几乎成了所有小提琴家必备的返场曲目,但大多数人流于矫情与模仿,如何拉出新鲜感?如何拉得自如而毫不做作?前年听他拉这个曲子,还没感受到他把忧伤当做自己的心声来拉,可这一次,忧伤似乎变成了他自己的,而且,在轻重处理上,他先是不动声色,渐渐渗透其中。真正痛苦的人,绝不天天将痛苦挂在嘴边,也无需一定用泪水表达。

陈曦的演奏虽不能冠以“小提琴诗人”之称,但我们能感受到他那诗化的诠释。情感处理十分得体,细腻而理性。陈曦的琴艺,这两年进步惊人,这与他在耶鲁读研究生是分不开的。“如果他在柯蒂斯毕业后就走向市场,不会有今天音乐的醇美。”陈曦母亲的话很让我感慨。迟一些走向市场,对于音乐的酿造是绝对有好处的。古典音乐有如酿酒,越积淀,就越醇美。注重内韵,厚积薄发,才能终成大器。

有人说,21世纪的小提琴家有两位君子,一位是格吕米欧,一位是谢林。格吕米欧有时还有些浪漫色彩,可是,谢林始终不带一点火气,他演奏的那些曲子有一股清新味道,尤其拉柴可夫斯基的第二乐章,像清香龙井。在我的感觉中,陈曦的追求,是东方大哲学,是水墨的意蕴,是无形的大象,而非拉宾或帕尔曼的油画般的辉煌。这可能是更难的选择,需要耐得住寂寞,需要坚韧,尤其在物欲横溢、娱乐至上的当下。那是一种修行,能持否?

摘自《深圳特区报》

我们需要独处来调整与恢复能量,狂欢可能会快乐,大多数的时候都会感觉弹精竭虑,因为每个人都希望是主角,又不愿看到与自己不同的人表现出挑,或者无法忍受与自己表达的人,时常称其为爱出风头。而独处时,内心的声音才会显现,会发觉原来很多时候,并不是你不想说话,只是说了,往往需要花更多气力去解释,才可以表达明白,才会不被人家当作异类,更多的时候是根本连说的意愿都没有,可是又突然轮到你的时间了,只得敷衍吧,限时发言又无需辩论的锋芒……

无论怎样,当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的时候,现实的秩序又突然幻化为理智的擎天柱,将一切不符社会秩序、影响人际和谐的念头踢出行动的圈子之外。

一切终将随风,不妨作朵自在的蒲公英。

摘自《小品文选刊》

到乡村去找生活和灵魂

熊培云

城市,对于许多人来说,就像是一个巨大的过关游戏场。游戏者不舍得放弃已经得到的,还要为新的奖励不断过关,任凭工作劳心劳力,永无闲暇,谁还有心思像梭罗那样把清晨的散步当做是对一天的祝福,然而失去森林的我们,散步却总是在失眠的夜晚,在自己的床上,从左到右,从右到左,辗转反侧。

更多的情形是,人们似乎只能通过消费机器来安排自己的人生,他们抱怨平时锻炼太少,然后打车去健身房,在跑步机上挥汗如雨。总而言之,在顾此失彼的现代化与城市化的单向度推进下,人们是活得越来越不耐烦了。几代人建设一幢房屋的耐心没有了,“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的诗意没有了,责任心也没有了。谁需要大树,谁就花钱到别处去挖;谁需要乘凉,谁就买个电扇回家。

在巴黎,我看到法国人会花几

年时间去巴黎圣母院修葺外墙,而我们有些人,恨不得把它拆了重盖一个新的。农村本是最有条件慢条斯理地建设的。相比城里的快节奏,我所体会的乡村生活原是另一番景象。当你行走于田野,这里上接天,下接地,中间是与你共生的万物。你不会因为老牛走得缓慢而沾沾自喜,也不会非得撵上一只奔跑的野狗以证明自己的速度与价值。当你把种子埋进地里,除了浇水施肥,你知知道安心等待,而不必心急如焚地蹲在地里等待“第一桶金”。只要时间到了,它自然会生根发芽,开花结果,“一半在尘土里安详,一半在风里飞扬”。

然而,当前急功近利的现代化与城市化,使乡村一点点沦陷。现在农村有一半问题则出在“你不要城市化,我强迫你城市化”。种种逼迫的背后,显然在于控制了社会生长的速度,而不是由社会自我决定

自己的生长。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发生在欧洲的另一个意味深长的故事:据说,当年罗马军队带着葡萄的种子到达位于高卢的博纳时,发现这里特别适合葡萄的种植,于是他们便和当地农民一样边种植葡萄边酿酒。谁知三年后,当军队要开拔时,有近半士兵都留了下来。为此,查理曼大帝后来还不得不颁布法令,禁止军队经过博纳。在这里征服罗马帝国的,不是博纳,而是生活。准确地说,是平民的生活愿望征服了帝王的政治野心。然而,这才是历史最真实的面貌——所有帝国终究灰飞烟灭,只有生活亘古长新。

必须保卫乡村,正如必须保卫社会。然而我在这里强调的需要保卫的乡村,并非地理意义上的乡村,而是一种乡村主义与乡镇精神。它们与所谓的主流保持着一定的距离,不甘心卷入狂飙突进的时代游戏。就像写在电影《云上的日子》里的古老寓言:如果走太快了,灵魂跟不上,你就要停下来,等一等自己的灵魂。

摘自《年轻人》

红尘滚滚、良辰美景的世界是真的托在一朵花上,它随时会坠落、陨落,“落花流水春去也,天上人间”。

这是绝对的幻灭感和绝对的脆弱感。在《红楼梦》中,黛玉听到的正是《牡丹亭》的曲子,中国古代文明中两个最脆弱、最敏感、最阴柔的灵魂必然相遇。

脆弱有什么好?值得你摇头晃脑地赞叹?看官必会如此断喝。我承认,脆弱没什么好,我正在努力将自己锻炼成钢铁战士。

我要说的是,对脆弱没感觉肯定是看不懂《牡丹亭》、《红楼梦》的。看不懂《牡丹亭》、《红楼梦》当然不要紧,比较要紧的是一种丝毫没有脆弱感的文明。其中所有的人都会像吃了“伟哥”,兴致勃勃,亢奋折腾,热火朝天地瞎忙活,死气白赖地硬挺着。而硬挺着为什么,没人知道。

所以,今夜且听《牡丹亭》。昆曲是软的,颓的,在无穷无尽的水磨缠綿中,姘紫嫣红开遍处,终于与断井残垣。走过了三生路,便是曲终人散,茫然四顾,问一声:“赏心乐事谁家院?”

摘自《美文》

赏心乐事谁家院

李敬泽

《红楼梦》里一段。花已葬完了,宝玉据说有应酬,兴冲冲地凑到姐妹堆里去了。剩下黛玉一个在园子里寻寻觅觅,正好就听到香院里笛韵婉转,歌声悠扬。偶然两句吹到耳内,明明白白,一字不落:“原来姹紫嫣红开遍,似这般都付与断井残垣。”

再听还有两句:“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乐事谁家院。”听得个大小姐心动神摇,如醉如痴,不免又哭了一场。

哭什么呢?问林黛玉她未必说得出来。问红学家,他们倒是能说,你却要捂着耳朵跑。想必就是黛玉同志在与封建礼教的艰苦斗争中感到孤独、迷茫,云云。

这么揣测不是毫无根据。前几日看昆曲《牡丹亭》,戏单子上就把杜丽娘称为反礼教的斗士。反封建、反礼教,这是通行了近百年的信条,我不敢非议。我只是觉得,如此看《牡丹亭》和《红楼梦》,未免是猪

八戒吃人参果,吃也吃了,却不知滋味也。

古人和今人一样,都爱说大道理,也都讨厌大道理。比如《牡丹亭》里,一上来杜丽娘她爹就板着脸教训:整天睡懒觉,不好好读书,这孩子怎么这么不上进!这和当代的爹是一样的口吻,当然不招人喜欢。但恐怕一百年后的爹也还是这么说话。

于是“问题少女”杜丽娘就不得不爬起来读书,读书之余就“游园”、“惊梦”,就被一片落花吓掉了卿卿性命。

我在台下摇头晃脑听到这儿,几乎要跳起来:汤显祖汤先生啊,如今可是二十一世纪了,你让中国人民怎么相信天下还有这么脆弱的水做的儿女?何况据说她还是反礼教的斗士!

——这就是今人和古人的重大不同。在古人,比如汤显祖、曹雪芹和杜丽娘,林黛玉看来,这个